

大同世界就在眼前？

評湯林森的《全球化與文化》

魏 均*

全球各地社會對於當前的文化全球化過程的關注程度愈來愈高，本書是全面探索相關議題的先趨學術著作，具有指標性意義。

書 名：全球化與文化（Globalization and Culture）

作 者：John Tomlinson

譯 者：鄭榮元、陳慧慈

原著出版日期：1999年

譯本出版日期：2000年第一版，2003年第二版，並改書名為《文化全球化》

原著出版社：Cambridge: Polity

譯本出版社：韋伯

英國傳播學者約翰·湯林森（John Tomlinson）在1990年代初的重量級著作《文化帝國主義》¹，展現了他豐厚的學養，以及細緻論證的功力，將一個要不被人太過簡化運用，要不就是被賦予過度複雜模糊意涵的詞彙「文化帝國主義」，做了一個從裡到外、從外到內，全方位的拆解和探討。然而，湯林森不只是一要解剖這個概念，還要為它作出歷史定位。在他看來，文化帝國主義根本是個不恰當的架構，而現代性（modernity）的興起和發展，才是掌握跨國家、跨文化傳播問題的正確軸線。從這個角度出發，當前最重要的跨國家、跨文化傳播現象，是全球化，而非任何定義下的文化帝國主義。但或許是該書論證重點已然完成，又或許是當時湯林森

* 作者魏均為淡江大學大眾傳播學系助理教授，E-mail: 120196@mail.tku.edu.tw。

自認思維尚未發展成熟，在該書最後的全球化討論只是點到為止。

八年之後，湯林森以《全球化與文化》（以下簡稱《全》書）給了我們一套完整的全球化論述，也算是充分回答了當初他對於文化帝國主義論述之替代性方案的提問。在這本書中，湯林森延續他有關現代性的思考主軸，提出全球現代性（global modernity）的概念，由此討論文化與全球化的相關面向：包括文化在全球化過程裡的位置、全球文化（global culture）的意涵、全球化的文化條件，以及文化全球化的未來遠景勾劃等。這本書是不是能夠恰當地掌握當前的跨國家、跨文化傳播現象？本文就根據這本書的三個核心議題來作簡要的討論。

一、文化全球化的多面向動態

全球化無疑是一個多面向的轉變過程，牽涉到政治、經濟和文化。然而許多學者僅僅是「提到」這一點，卻無法指出究竟這些不同面向是以什麼樣的動態（dynamics）以及什麼樣的交互連結（inter-connections）在運作的。《全》書就是一例。

《全》書至少忽略或是避重就輕了全球化文化面向的兩個連結關係。第一個是傳播科技與文化的連結。湯林森主張傳播科技像是傳輸器，在全球化進行的所有面向裡，只是扮演著傳輸工具性符號的角色（pp. 20-21）²。因此，他認為，「傳播科技的發展本身並不能等同於文化全球化」，此點強調尚屬正確。不過，另一方面，他又提到，除了某些經常穿越國界的商業人士，大部分的尋常百姓其實都是透過某種或是某幾種傳播媒體去經驗所謂的全球化文化（globalized culture）。既然如此，他卻越過對於尋常人們使用傳播科技與經驗全球文化，以及這些使用和經驗過程的社會脈絡之具體分析和研究；反而是在該書第五章中，對於傳播科技以及不同媒介傳播（mediated communications）的意義，進行麥克魯漢式的抽象後設思辯。這不能說只是個人學術興趣的選擇，而是已經犯了論證上的缺失。

第二個被忽略的連結關係則是全球化文化與跨國媒體集團之間。透過傳播科技進入全球許許多多家庭之中的全球化文化，並不是自然而然出現的，絕大部分是由跨國傳播企業將符號和意義商品化之後的結果。而這些傳播企業提供文化商品的主要動力，並非各地社會的特殊需要，而是利潤邏輯。當然，這些訊息不必然是「壞」的，但顯然不是從在地觀點出發。湯林森推崇備至的所謂「全球在地化」（glocalization）的說法，並未自外於這個原則。

二、關於民族國家的角色與「去疆域化」(deterritorialization) 過程

湯林森對於全球化文化的讚譽，最主要在於全球化文化可以帶來相異的元素，使我們免於持續生活在國族／國家文化的陰影之下。在他看來，民族國家操弄其人民的文化想像，但是全球化文化卻可以提供所謂「文化脫勾」(cultural disembedding) 或是「去疆域化」的文化經驗。關於這一看法，有一些需要推敲之處。第一，儘管湯林森一再向紀登斯提出的「反身性」(reflexivity) 致意，但是他自己卻對國族／國家文化這個概念和實踐，以及(非西方)民族國家的角色採取絕對的負面立場。國家機構試圖建構某種統一版本的國族文化，從民族國家興起以來就是如此，不分東西南北，也無分政體制度；但是湯林森似乎以為只有那些「非西方」國家的國家機器會這麼做。而我們也看不出來全球化文化為什麼一定會是各個在地市民社會的唯一救贖。這不只是因為，那些國際傳播集團的母國，也跟其他地區的國家一樣，會以各種間接與直接方式介入文化生產與塑造理想的國族文化；也是因為，如前面所提到的，這些跨國性的文化產品內容，絕大程度上都不是根據各地社會的特殊發展需要而生產的(頂多是根據各地的市場偏好)，更不是為了解決各地的國家與市民社會之間的矛盾和問題而設計的。

其次，湯林森所謂全球化的文化條件——去疆域化，果真必然是個靈丹妙藥，有百利而無一害？他說，去疆域化的文化經驗對在地人民的物質條件和環境會產生直接的影響，因為這些經驗擴大人們日常經驗的相關視界(horizon)(p. 115)，他也毫不質疑地讚許跨越國界的新傳播科技將帶來不同於在地文化(local culture)視野的新觀點選擇(p. 116)。顯然湯林森再次將全球化文化看做是一個中立、純真又無邪的東西，他們將帶來與「傳統」在地文化不同的觀念。問題是這些(主要由少數跨國資本生產的)全球化產品所建立起來的是一個什麼樣的「視界」？確實是一個「更擴大的」視界嗎？還是帶來另一些限制的「視界」？

第三，對各個在地的市民社會與生活於其間的人民(特別是非資本主義發達國家)來說，最迫切的事情也許並不是像湯林森所舉「跨越國界的議題」(例如全球污染和溫室效應等問題)，卻更可能是當地由跨國企業所引入的環境污染問題。主動去了解溫室效應與我們生活的關係雖然重要，但問題在於，進口的文化產品推銷的大多是消費主義至上的意識(過度的消費顯然跟溫室效應的惡化有關)，或是跨國企業的美好形象(例如杜邦以前在台灣的公關操作)，而不會教導人們如何發展

出抵抗「進口污染」的行動策略。

第四，湯林森肯定全球化帶來的文化混雜性 (hybridity)，認為混雜文化是掌握跨越國家文化的空間中某種新型態文化認同的有效概念，他們不同於國家文化的統一性，比較「變化多端」；尤其是青少年文化 (p. 147)。但是他卻將權力關係與霸權過程存而不論，對於文化混雜進行的過程模糊其詞。有關「參與混雜的各個文化元素和邏輯有怎樣的比重與關係？」、「混雜性對於在地社會的意義究竟是什麼？」等問題略而不答。對於像台灣這樣的社會來說，當前青少年流行文化的議題重點，並不在於究竟這股文化可以「混雜」到什麼程度，而在於這些文化能跟年輕人的日常生活處境發生什麼關係。

三、關於「世界大同」(cosmopolitanism) 的「宏遠」計畫

儘管樂觀期待所謂的「未來」大同世界的人民是同時生活於全球與在地，也同時是普同主義者和多元主義者 (pp. 194-195)，但是湯林森總是過分低估了「當前」存在於不同文化、社會與國家之間的種種不平等權力關係。他犯下跟自由多元主義者同樣的錯誤，對於一個包容所有文化元素的多元世界充滿想像，但是卻忽略了，在這樣的世界到來之前，當代的全球化文化動態本質為何，不同文化之間的權力不均又該如何解決。

就這個主題，湯林森再次向充滿潛力的青少年文化致意。他先說，「當代環繞著音樂、舞蹈和時尚所組成的青少年文化，很明顯的具有商業性質」，但是，「這些文化在很多方面也是具有世界大同性質的，完全跳脫了國家或是族群單位具有的排他性」(p. 200)。令人不理解的是，為什麼任何能夠排除國族或族群文化的實踐就一定是值得肯定的？即使是一個明顯遵循商業邏輯的大同世界？不僅如此，如果我們完全不信任在地的文化邏輯和某種公共的國家介入，為什麼卻能夠信任在現存的全球權力結構與經濟邏輯下建立的跨國企業，能夠將我們帶往那個理想的世界？

就文化議題來說，許多社會迫在眉睫的問題，不是怎樣去創造一個大同世界文化，而是如何維繫即將消亡的在地文化。這個在地文化並不是先驗的存在，也不必然是國家機器控制的統一文化組成，而是實存在每個社會之中，是每個社會裡的人們藉以表達他們自己的想法、表現他們的創造性，以及與其他不同的文化和想法對話、互動的最重要符號資源。在這樣的多元平等對話過程中，大同世界才有成形的基礎。除了極端的民族或種族主義者，沒有人會反對大同世界的理想，只不過，在

解決目前嚴重的全球文化不平等交流的問題之前，談大同世界是不是太早了些？

當前文化全球化的議題方興未艾，亟待學術界進行全面的關注，《全》書先趨式的探索，具有重要的意義。然而，爲了突顯自身立場與悲觀論者之不同而顯現的過度樂觀（反之亦然），必然容易模糊視野。相對而言，能夠觀照權力關係動態的具體文化現象分析，比起複雜精緻的理論層次推演，顯然是重要許多。

註釋

- 1 *Cultural Imperialism: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1991, London: Pinter。該書中譯本由馮建三譯，時報出版。
- 2 本文所引頁碼爲英文原書之頁碼。